提升中国世界遗产相对中华文明的完整性

吕 舟

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中国的良渚古城遗址和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中国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1986年开始申报世界遗产，经过30多年的努力，已有55处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成为拥有强大的研究、保护和管理力量的遗产保护强国。中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基本构成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多样性的表述体系，自然遗产也基本反映了中国多样复杂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生物、生态。

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基本能够涵盖中国从旧石器、新石器到整个历史年代的文明发展过程，从世界遗产的角度形成了对中华文明的阐释，表达了中国的文明观和历史观。中国在几千年人类发展历史过程中文明传承不绝，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

中国对于世界遗产（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两个基本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基于对中国文物保护的认知，选择文物保护单位中价值最为突出的对象，推荐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最为典型的1987年中国第一次申报并列入世界遗产的项目：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北京故宫、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长城和泰山。这些遗产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明和历史的魅力。其中莫高窟以符合世界遗产关于文化遗产的全部6条价值标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泰山更以既符合文化遗产的全部6条标准，同时符合自然遗产的第一条世界标准成为世界遗产中数量最少的世界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在世界遗产的历史上，除了莫高窟之外，只有威尼斯符合文化遗产的全部6条标准。而既符合文化遗产的全部6条标准又符合自然遗产标准的只有泰山一处。这反映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和国际社会对中国世界遗产地所具有的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充分认同。在此之后，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1994）、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1994）、武当山古建筑群（1994）、苏州古典园林（1997）、北京皇家祭坛—天坛（1998）、北京皇家园林—颐和园（1998）、大足石刻（1999）、龙门石窟（2000）、云冈石窟（2001）等重要文物保护单位相继列入世界遗产。

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在苏州召开，引发了中国社会对世界遗产的关注，随着对世界遗产认知的发展和对世界遗产新类型的研究，中国世界遗产的申报和保护进入第二个阶段。世界遗产在上世纪90年代增设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如文化景观、文化线路、遗产运河、工业遗产、20世纪遗产等，受到广泛关注。五台山（2009）在申报中强调了其佛教圣地的价值，并以文化景观的类型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反映了对文化景观的认识和理解。2011年杭州西湖以文化景观的类型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第一个主动以文化景观类型申报的项目。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时中国对世界遗产（文化）的认识已经远远超出了文物保护单位的概念，关注到了文化与自然遗产的融合、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融合，形成了更为整体的遗产观念。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反映了中国在世界遗产的保护中形成了新的遗产观念，对这类巨型遗产的研究、申报、保护和管理能力有了新的发展。2017年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反映了中国在遗产保护中关注遗产与社区的关系、遗产保护对地方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也反映了中国对于世界遗产认知的进一步深化。2017年，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给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颁发世界遗产证书时的讲话中表示，这座小岛有着巨大的价值，是给全世界的一堂文化对话、交融、发展的教育课。

中国在自身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对整个人类文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世界遗产的申报中如何表达这种文明成就，如何重点研究、推进反映这种成就的项目，推动反映中国传统世界观、自然观和文化精神的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在世界遗产的平台上讲述中国的故事，表达中国文明的价值观，应当成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遗产的申报不应仅仅依赖于地方的积极性，而应当从国家层面建立中华文明的讲述体系，选择适宜的遗产地做重点培育，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世界遗产预备清单体系，加强和完善中国世界遗产相对于中华文明的完整性。在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预备清单上，一些项目反映了中华文明对世界的影响，例如中国的瓷器和茶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尽快推动在预备清单上的景迈古茶林、景德镇御窑遗址、中国古瓷窑址等申报世界遗产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更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明，如何在世界遗产中反映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也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在预备清单中有诸如侗寨、黔东南苗寨、圣山圣湖这样的重要项目，尽快推动这些项目的申报工作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世界遗产应当承担起唤起国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豪感的责任，《世界遗产名录》上的每一个中国世界遗产都值得中国人为之自豪。

中国通过世界遗产保护的实践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的遗产保护能力的国家。今天在柬埔寨的吴哥、尼泊尔的加德满都、乌兹别克的锡瓦古城等的世界遗产地或重要文化遗产地都可以看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力量，在参与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工作。2019年6月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的中国—非洲世界遗产能力建设与合作论坛上，中国政府和专业机构更是表达了支持非洲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合作进行能力建设的意愿。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在世界遗产相关的文化对话、和平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7月3日，石家庄市井陉县晋剧团的演员来到河北省行唐县北河乡西科头村，为村里的群众带来一台晋剧大戏《喜荣归》。此次下乡将在行唐县西科头村、安家峪村等12个村开展为期4天12场次的演出。

井陉晋剧在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已经传承了170多年。近年来，该剧团为了更好地传承井陉晋剧，让更多群众欣赏到精彩的晋剧演出，常年深入乡村开展文化惠民送戏下乡活动，每年为群众演出近500场次。

图为文化下乡演出现场。

张秀科/图
本报驻河北记者
李秋云/文

巴渝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文物史料展：

见证历史 整装出发

本报记者 李佳霖

7月1日，“初心·使命·奋斗——巴渝地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文物史料展”在重庆市九龙坡区铜罐驿镇中共四川省临委会扩大会议会址暨周贡植故居开展。该展览由重庆市九龙区委员会、重庆市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主办，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等承办。240余件原始档案、170余张珍贵照片，形象生动地展示了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在重庆地区的发展历程。

重庆开埠是近代重庆、四川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的起点。与之直接相关的有3个不平等条约，即中英《烟台条约》《烟台条约续增专约》和中日《马关条约》。很多人只知道条约的内容，但没有见过条约的真容。这次展览首次向公众展出前二者的复制件。

“我们为寻找这两个条约花了近40年时间。”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表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搜集研究重庆开埠历史的资料，找遍全国各地，都没有找到上述条约的原始文本。直到2018年，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周勇的学生刘婧雨到英国牛津大学开会，周勇安排她去英国国家档案馆查询“外交”档案，在荷兰莱顿大学研究员张克雷的协助下，刘婧雨终于在“贸易”类档案里找到了条约的目录。2018年4月，周勇赴英国国家档案馆查询，最终见到了《烟台条约》和《烟台条约续增专约》的原件。

打开条约原件的那一刻，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烟台条约》由“大清钦差便宜行事大臣李鸿章”和“大英钦差驻华便宜行事大臣威妥玛”签署。打开条约内页时，火漆与页册粘连在一起，可见自1876年签署以来未曾有人翻动。“我们是第一批查阅此件的重庆人。”周勇说，“如今，我们将这两个条约的复印件展陈出来，与观众一同见证那段屈辱的历史和先辈追寻民族复兴的步伐，特别有意义。”

1920年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即《重庆报告》，是展览中最为耀眼的展品。在一面巨大的透明电子屏幕上，滚动播出着《重庆报告》的要点。据《重庆报告》记载，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于1920年3月12日成立。组织机构包括书记处和宣传、财务、出版三部，在川西、川西南、川东南、川北和川东建立了支部，而重庆是“总的组织”“正式组织”。目前《重庆报告》已经被浙江南湖纪念馆列入中共一大史料陈列，填补了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版图西部地区的空白。这次是《重庆报告》第一次公开在重庆展出。

巴渝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文物史料展首次公开展出了1926年中共中央对川渝党组织的高度评价——“川省现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有为别省所不及者”“这是巴渝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也是党中央对他们的高度评价。同时更是对当下每一个共产党员灵魂的拷问。”此外，展览还第一次展示了当年在周贡植故居召开的中共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的警句，比如“只有从工作中，才能改正同志的毛病”“只有从斗争中，才能锻炼同志的勇气”。

一件件革命“传家宝”，展现着巴渝地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历史以及革命先烈浴血奋斗、英勇悲壮的光辉业绩，回答了历史和人民“为什么”和“怎么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告慰先烈，资政育人，就是要生动再现巴渝地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整行装再出发。”周贡植故居相关负责人表示。

“每件档案及展品都述说着一段或惊心动魄、或可歌可泣的往事。”在周贡植故居，观众参观展览后表示，透过这些红色文物，感受到红色基因在传承、奋斗的力量在凝聚。

昆明文庙举行开笔礼

开笔礼现场 肖依群 摄

本报讯 （驻云南记者肖依群）7月5日，2019年春城文化节“花儿朵朵向太阳”——春城少儿艺术节传统文化开笔礼活动在云南昆明文庙大成殿前举办，这也是昆明文庙恢复性修建项目一期工程完工后的首次开笔礼活动。

开笔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少儿开始识字习礼仪式的称谓，俗称“破蒙”，是一种流传久远的儿童启蒙教育方式。活动中，48名身着汉服的新生整齐站立，面前的小方桌上摆放着笔墨纸砚。老师为孩子们正衣冠、点朱砂，一起面向文庙大成殿行拜揖礼，之后进行击鼓明志、启蒙描红等环节，最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齐声诵读《三字经》。仪式结束后，昆明市第二十八中学、昆明市长春小学的孩子们和昆明市五华区护国街道办事处文庙社区的工作人员表演经典诵读，嵩明洞经礼乐团演奏传统洞经《上供曲》等。通过参与此次活动，孩子们领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迈出孝亲尊师的第一步。

此次活动由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昆明市五华区护国街道、五华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护国街道文庙社区、昆明市文化馆承办。

“唐蕃古道——七省区精品文物联展”亮相宁夏博物馆

本报讯 由青海省博物馆组织发起的“唐蕃古道——七省区精品文物联展”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在银川市宁夏博物馆一楼临时展厅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展期为6月21日至10月8日。

此次展览精选了来自青海省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宁夏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四川博物院、西藏博物馆、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西州民族博物馆、青海省湟源县古道博物馆馆藏的唐蕃古道精美文物200余件，集中展示唐蕃古道的繁荣盛况，文物来源广泛，精美程度较高，类型丰富，器物多样，展示手段灵活，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唐蕃古道是我国著名的三大古道之一，全长3000余公里，跨越了陕西、甘肃、青海、四川、西藏等省（区），是唐代以来中原内地去往青海、西藏乃至尼泊尔、印度等国的重要通道，也是丝绸之路南道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展览以高科技手段，将曾经发生在这片热土上的历史故事及唐蕃古道线性文化遗存全面、系统地进行展示与宣传，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了解、宣传唐蕃古道的历史与文化，共同助力丝绸之路南亚廊道申遗工作。

（祁小宁 蔡文斌）

四川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在广东展出

本报讯 （驻广东记者谭志红）7月4日，由广东省博物馆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办，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协办的“沉银重现——四川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在广州广东省博物馆开展。

该展重点展出“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是广东省博物馆2019年度国内文物交流的大展之一，也是广东省博物馆继2018年成功推出“古蜀宝藏——四川文物精品展”之后，粤川两地文博交流的又一重头文物展览。

展览分为“沉银之谜”“江口沉银”“水下考古”三部分，共展出江口古战场遗址相关文物421件，包括江口古战场遗址出水文物和当地在工程施工时采集的文物，“5·1彭山区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追缴的4件国家一级文物也在该展中亮相。

江口镇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府河在此汇入岷江。清代文献曾有记载，此处为明末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沉银之处，当地一直以来有许多关于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2015年底，来自国内多家文博机构的专家聚集在彭山，经过多番调研与讨论，基本确定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即为历史记载的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经过一系列科学勘探后，2017年初，“江口沉银遗址”开始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大量金银文物陆续重现于世。目前，“江口古战场遗址”通过2017、2018年两度发掘，共出水文物4.2万余件。

7月6日，在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水族马尾绣非遗传承人韦桃花在工作室内缝制马尾绣作品。

水族马尾绣，是以丝线缠裹马尾盘在描绘好的花纹轮廓上，再根据轮廓线绣出各种图案，工艺复杂，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水族妇女世代传承的一种特殊刺绣技艺，被称为中国刺绣的“活化石”。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